

论社会转型期人的德性价值观的嬗变

马俊峰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德性,这意味着德性构成古典政治哲学所蕴含政治的道德基础。德性概念不仅规范着古希腊城邦的政体,也同时规范着古希腊城邦的道德旨趣。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社会大的转型期中马基雅维里以前人未有的胆识,发起一场“古今之争”。他使得政治哲学从古代转向了现代,德性内涵发生了变化,道德基础发生了位移,因此,对于德性概念内涵演变的探析,为把握西方政治哲学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德性;政治;道德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0)06-0011-05

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多元并存,使得相对主义极其泛滥,一切盛行的风尚致使人们迷失自我和发展方向,以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试图扭转这种风气,主张回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一种德性的政治哲学被再次复兴,因此,德性就构成我们把握古典政治哲学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关节点。德性一词蕴含的意义转换,标志着政治哲学是从理想性价值向现实性原则发展,这使我们认识到对德性观念的内在含义演化的探究,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脉络,理解西方现代性危机的缘由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解析德性观念的历史变化对政治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德性与美德:从事物向人的品性扩展

德性,希腊词 *arête*,在希腊文中 *arête* 原指万物的特长、用处和功能,《希英大辞典》解释为 *goodness, excellence of any kind*。意味着人、动物和任何一种自然物都有自身所固有的,而他物却没有的特性、品性、用处和功能;荷马的《伊利昂纪》中说更善于奔跑的马就是拥有更高的 *arete*。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讲到棉花的 *arête*。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讲到马和剪枝刀的 *arete*。乔伊特等人的英译文都是将这 *arete* 译为 *excellence*。而我们一般将英文 *good* 译为中文的“善”,这就会产生“马的善”、“房子的善”、“土地的善”等不好理解的问

题。其实中译的“善”和英文 *good* 都是来自于希腊文 *arete*,是指各种事物的特性、品性、特长、优点、功能^{[1]67}。在古希腊后期,*arete* 的内涵由事物的本性开始开展到现实社会各方面,即伦理、经济、政治、哲学、科学等领域。这种由德性向美德微妙变化,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向,即苏格拉底的转向。

这种转向恰恰是德性的话语被苏格拉底置换为美德话语,从此以后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美德一词。有趣的是,苏格拉底在阿里斯托芬《云》的形象就是一个被篮子悬吊在空中的自然研究者,一心专注于自然的研究,即专注研究自然物的 *arete*,而忘记了人的事务。在希腊人看来,这种研究方式和研究态度就是对现实人们所遵从的习俗和法律的蔑视和不敬,这种对自然事物的研究行为激起了雅典人的愤怒,以致后来雅典人在苏格拉底审判中以此作为定罪证据,罪名为不敬神。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从天上转向人间,关注人的事务,提出“美德即知识”,指出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记载:“苏格拉底说,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凡认识这些的人绝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的人也决不可能将他们付诸实践。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

收稿日期:2010-07-06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基金项目(NWNU-KJ CXGC-SK0303-13)

作者简介:马俊峰(1969-),男,甘肃张家川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

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和其他美好的事情都是美德,很显然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便都是智慧。”^{[2]117}显然,苏格拉底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正义和其他美德都是智慧,如果说智慧不疯狂,意味着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限度,他明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只有这样,他才会赢得神的喜悦和垂青。

柏拉图从知识、灵魂和政治三个方面考察正义德性,它们构成德性的三位一体结构,在此结构中,柏拉图把客观知识的秩序与城邦的正义秩序等同起来。从人的知识积累中,看到灵魂的上升及正义的实现程度。柏拉图利用线喻来表达知识秩序和正义秩序,他认为“存在和认识两个系列都可以各自分为四个阶段,这就是所谓线喻。他说有两种力量,一种[善的相]是统治理智领域,另一种[太阳]则统治可见领域。”^{[1]792}具体的讲,存在可分为影像、影像的实物、无形物的世界以及最后的原理,与此同时,认识分为想象或猜测、信念、理智和理性。柏拉图认为,政治正义通过灵魂正义来实现,人的灵魂中的三种属性——激情、欲望和智慧达到平衡时,人的内心就处于和谐之中,也就是说,人遵循了宇宙的和谐法则。柏拉图把个人身体所处的世界的真实性还原为灵魂的真实性,城邦的道德品质源于个人,那么,当个人灵魂正义的实现时,即理性能够对欲望和激情加以适当调控,在不剥夺欲望和激情存在的合法性时,正义可以回到灵魂的意识中建立起人之为人的神圣形象。然而,如果将它扩大到城邦时,就是城邦的政治正义的实现。即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能够各行其事,各尽其性。最终,政治正义实现了个人、城邦和宇宙重新处于一个同心圆结构状态的必然进路中^{[3]191}。人回归宇宙正义,正义又体现了宇宙的内在和谐。从柏拉图对正义的不同视角的分析和解释中,我们深深地感到,柏拉图把正义德性置于他潜在的宇宙论目的论的预设中,正义最终体现宇宙的秩序,宇宙秩序是最高的秩序,对宇宙秩序的知识,构成知识正义,当知识正义进入人的灵魂,在灵魂中所形成的三种属性(欲望、激情和理性)相互平衡而构成灵魂正义,把它放大到城邦则构成政治正义,城邦正义使得宇宙秩序在公共领域得以实现,完成了宇宙论目的论的要求和所追求的目的。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了理想国中的等级说,等级说证明了宇宙万物都具有自己的特性 arete,保持自身的独立,每个事物都处在自己相应的位置而不僭越,而形成宇宙的和谐秩序。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一种使个人能够朝着实

现人所特有的 telos(目的)而运动的品质,无论这个目的是自然的抑或超自然的^{[4]235}。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开篇写道:“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宇宙万物都向善。”^{[5]1}这就充分表明了亚里士多德目的论把善看成是人的活动、探究和实践的旨趣,是人类的本性和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核心的美德是 phronêsis(智慧),phronêsis 是一种理智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正是这种理智美德,才使得品格美德(virtues of character)得以践行,因而,理智美德和品格美德密不可分。在亚里士多德的德目表中,正义和友爱是两种主要的德性。正义是城邦的德性,友爱则是人与人结合的德性,也是城邦与城邦间结合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德性整体,它是一种完全的德性,有了这种德性,人们就不但以德性对待自己,还能以德性对待他人,它是立法之根本,体现全体公民利益。因此“正义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5]97}这就是说,正义是从整体的利益或者个体公民的平等性来考虑全部的法律、伦理和生活关系。如果诸德性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银规则的话,那么正义就是一条金规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高度道德要求,它实行的是完全的德性。

(二)美德和神性:从人走向神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由于人们受神学的教化,使他们认识到人及其创造物的终极目的是上主的荣耀,他们是为此目的而被创造的,这也是他们存在的原因,并为达成此目的而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人不能在自身的生活或者在现世的福利中找到最高的意义,他应该在现实上主的永恒计划、在上主的光荣以及与上主的相遇里找到最终目的。他们通过敬拜的行为,如祈祷、祭祀、神圣礼仪、敬礼庆祝,开启人自己的心灵,最终朝向上主并与神合一。

基督教的美德在《格林多前书》13:13 表述:“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这就意味着,人们是基于信、望、爱三德既理解上主的圣言的,他们在内心接受它并且做出回应。与此同时,基督教德性能使人与人的整个行为同天主旨意及天国联系起来,这将显示了基督教德性对基督徒的重要性。因此,《圣经》与教会传统都认为它们是人得救的必然前提。据《圣经》的教训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德、望德和爱德,就不能成义、不能获救。信仰是人得救的前提。

“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马尔谷福音》16:16)圣保罗多次强调,人通过信仰成义,通过信仰有生命,如果“没有信德,是不可能中悦天主”(《希伯来书》11:6)。所以,信仰成为一条诫命:“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字”。(《若望一书》3:23)保罗说:“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4:20-2)信仰意味着一日一日地离开背弃信仰的危险和诱惑;背弃信仰也包括放弃信仰之话语以及上主,并且将自己封锁在一种错误的自我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世俗主义之中。信仰意味着每天都如此祈求:“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马尔谷福音》9:24)信仰意味着用信仰去塑造自己的生活,让信仰在生命之中,就像光照亮一样,它照亮信徒的存在,释放信徒的能力以及每天所需要的生命力^[64]。

希望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希望,一个人就不可能生存。人体验到,最近的生存是一种渴望和奋争,一种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发自潜藏的冲动,并且渴求一种更好、更完美的生活。人不可能漠视自己追求完善与永恒无忧之幸福的欲求。但是,既然这种欲求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尘世生存之中得以彻底的满足,他就总是希望在将来能够实现^[65]。因此,在《圣经》中有大量的有关“望德”的陈述,如天主曾吩咐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赐给你……地上的万组都要因你得福”(《创世记》12:1-3)。“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圣咏》39:7;71:5以下;84;《耶肋米亚》17:7)

爱在《圣经》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圣若望说:“天主是爱”(《若望一书》4:16)这就意味着,上主的本质属性就是爱。又譬如“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你的天主”(《若苏厄》22:5)“现今上主你的天主想你有什么?是要求你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一切道路,爱他,全心全灵事奉上主你的天主,遵守我今天吩咐的天主的诫命和法令,好使你能获得幸福(《申命记》10:12以下)。”上主对人的爱:“众人的天主和父”。(《厄弗所书》4:6)天主以父亲般的爱关怀着人类(《玛窦福音》5:44-48;6:25-32;7:11)人对天主的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天主,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玛窦福音》22:37)爱是基督徒整个存在赖以奠基的基本条件所在(《厄弗所书》3:17-19)。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人对上主的爱是通过敬拜、默想、祈祷和朝拜与兄弟之爱的行为和事功表现出来的,基督徒认为默想、沉思和祈祷是获得关于上主的个人性知识的唯一途径,也是真正理解上主旨意及其为这个世界所定计划的唯一方法。基督徒一旦停止祈祷式与默想,就面临与上主及其真实旨意疏远的直接危险。这说明,基督徒一刻也不能停止默想和祈祷。正是这种要求,当基督教传入罗马,罗马帝国很快衰弱和消亡下去。正像马基雅维利说的,基督教把“这个世界搞得看上去女人气十足,天堂也被解除了武装,但是这种局面无疑是一些人的懦弱造成的,他们在解释我们的信仰时,只图安逸,不讲德行,假如他们认为,信仰允许我们壮大并捍卫自己的祖国,他们就会认识到,信仰希望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它增光添彩,为保护它而做好准备。这种教养,这些荒谬的解释,使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古代那样众多的共和国了,从而再也看不到人民中间有着像当时那样多的对自由的热爱了”^[72]。所以,马基雅维利想借用古希腊罗马的勇武强壮的德性攻击基督教女人气十足的德性,以便拯救这个世界,为此,他决心通过重新诠释德性,给这个世界提供一个发展的方向。

(三)美德与能力:人的技术化生成

在15世纪社会大转型和变革时代,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则把罗马共和国的神话落实到佛罗伦萨的实践,他们详尽论述了自由的意义,这些共和思想家对“自由”、“美德”等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城市人文主义者看来,美德便是真正的高贵,而“君主宝鉴”派的作者认为,“美德”是一种品质,它能使一个人在与命运斗争中获得荣誉、荣耀和名声。对此,马基雅维里持否定态度,因为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常常是忘恩负义、朝三暮四、撒谎和欺骗他人,他们躲避危险并贪婪地攫取利益。人的性情是邪恶的,既然如此,君主如果可能的话,不应该偏离善良之道,但是他应该知道如何作恶,知道如何善于利用半兽半人的身份。对统治者而言,他成为“半兽半人”是必需的,如果他不这样,他就无法稳坐政治宝座。君主是被迫懂得如何像一头野兽一样行动,学会既模仿狮子、又模仿狐狸的行为。这是君主应该具有的“德性”,依据这样的“德性”就可以成就大事业。因此,德性(Virtu)在马基雅维里的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第一,Virtu意味着一种“灵活的气质”或者随机应变的德性。马基雅维里认为,古代人深知以半人半马的

喀戎为师的好处,那么,现在我们的“君主必须通晓如何同时运用人性和兽性”,在政治活动中,依据“灵活的气质”来充分利用人性和兽性进行统治。马基雅维里之所以要倡导这种德性,源于他对人性的邪恶的理解。如施特劳斯所言,马基雅维里把人性理解为一种复合体,他以“野兽—人”的复合体取代基督教的“上帝—人”的复合体,从而把古代人秘而不宣的教诲大白于天下。当他主张君主应该模仿狐狸和狮子的形象时,他再次剔除了人的神圣性和高贵性,抛弃了人是向善的至善论,使得“野兽—人”让位于兽与兽的结合,这样,剩下的唯一的东西就是随机应变地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兽性,而那种坚韧和柔顺的品质在随机应变中得到彰显。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没有狐狸本性就没有稳定的狮子本性,而没有狮子的本性,狐狸的本性无从谈起,于是,马基雅维里就把随机应变看作一种德性。

第二,马基雅维里反对神学政治,因为基督教伦理学使人变得女人气十足,变得软弱,因此,主张把政治理论与基督教伦理学分开,来重新思考生活的目标。他希望意大利具有一种罗马人的德性,那就是人们精力旺盛,热爱祖国。这就意味着 Virtu 是指活力、生气、斯多葛式忍受苦难的能力,面对感的增强,勇敢顽强,雄心壮志,有进取心和权力欲^{[8]55}。伯林从伦理学角度对马基雅维里的 Virtu 一词作了诠释,认为马基雅维里的伦理观念是一种公民的、人道主义的伦理观念。其实,马基雅维里试图通过 Virtu 来赋予统治者以独特的品格,使统治者能够区别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原则,有效地实施统治,以维护国家的自由和安全,保障社会井然有序。凡是威胁到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情形则予以镇压和消除,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这种正当性是由共和国的政治价值所确认与赋予的。

第三,马基雅维里有时也将德行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认为它关乎君主在其“臣民与朋友”心目中的形象,马基雅维里通过对君主统治原则的探究,指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政治性的,他认为“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德性是政治化的德性,政治效果是人们理解德性的依据”^{[9]111}。他主张“政治的自主性”,认为德性内在于政治,德性就成为政治性的,这不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德性体现在政治当中,因而,他抛弃了一种德性的正义,他的著作未曾提及自然正义或自然法则,这正是他与传统政治哲学决裂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为了与传统政治哲学决裂,他从古典政治哲学的关键词入手,通过重新诠释和赋予 Virtu 新的内涵,虽然在形

式上保留了这个词,但其内涵却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第四,德性并不意味着品德高尚,也不是灵魂的完善,而是一种精明,是德性的评判者和向导,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理智德性高于道德德性。可以说,德性是通过精明和一种源自身体的经验共同培育的产物;它也意味着对善意的操纵。马基雅维里认为,在好人看来,善意足以成就事业,好人是自足的,不可教的,然而当德性无法说服好人相信那些迫使他们背离善意而迫不得已的情况时,就必须通过骇人听闻的极刑,使他们陷入恐惧,从而心甘情愿地服从。与此同时,一旦城邦陷入腐败,只有一个人的善意和德性的结合,才能够保持城邦的自由。同时,德性是一种警觉,野心勃勃,而不是一种习惯。一个人必须使自己适应缺乏稳定性的道德的苛求,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践行或至少佯装领会,以某些新的更好的意见,或者以充分假定取代不充分假定^{[9]145}。

马基雅维里对德性的改造使他之后的政治哲学走上了不同于古希腊至善的政治哲学道路。随着文艺复兴倡导的人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的公开使用,工业革命促进社会大的变革,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相互竞争,最终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赢得了胜利,共和主义伴随法国大革命的开始而退出了政治舞台。自由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主张一拍即合,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获得一种支持和辩护的思想资源。在这种大转型期间,资产阶级扬弃旧的德性观念,根据资产阶级利益的需求,革新制度,倡导宪政民主,最终确保个人的权利,使每个人的权利在自由主义的话语语境中得到完美表达和实现。因此,在这种转型期过程中,一旦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成为政权的统治者,他们就重新界定美德,犹如斯密所言,劳动不能改变人的价值,“安逸”才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这样,资产阶级把古典政治哲学的善的德性置换为近代政治哲学的权利德性,使权利优先于善,开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他们在此基础上回应和试图解决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问题。但是,现在政治哲学却把自己限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这种对产权的认识,使得他们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仅仅把特殊利益当作普遍利益看待,这就使自身无法超越,在强调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的同时,又把每个个体原子化,造成个体在社会中孤独、虚无甚至颓废,个人除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法将此升华为一种崇高价值,无法提升个体,个体丧失目标,最终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在面对社会转

型的价值中立而导致的多种价值并存的时代里,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联手,从政治哲学角度出发,要求重新恢复关于善在价值上对社会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性。而马克思主义也不敢落后,积极参与这场转型期德性价值观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劳动本身出发,指出社会转型期劳动仍然是人存在的价值所在,仍然是人的最好美德,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的自身,而且也创造了整个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生产劳动,“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0]因此,马克思用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论证劳动是人类共同体存在的依据,就此而言,他指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有鉴于此,马克思就把劳动升华为一种严肃的艺术,界定劳动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又是在运动过程中创建了人的价值,于是,这价值便与现实的活动有机统一起来了。

综上所述,在人类社会整个发展和变化中劳动是不可替代的,劳动应该是人的本体性存在的方式,有鉴于此,从劳动出发,实现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化,从而构

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它就是不同于现代政治哲学的,如果像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看作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这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康德化了,换言之,那就不是马克思真正的面相,而是康德式的面相。因此,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者,就需要不断地为马克思辩护,弘扬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 [1] 汪子嵩,范明生,等.希腊哲学史: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3] 石敏敏.希腊人文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4] 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6] 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2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7]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8] 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9] 曼斯菲尔德.马基雅维里的德性[A]//任军锋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陈于后

On the Evolution of People's Moral Values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MA Jun-f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lies in how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moral. This means that virtue constitutes the moral basis of politics in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Virtue not only regulated the ancient Greek government system, but also regulated the moral purport of the ancient Greek.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Machiavelli launched a “classic and modern war”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He shifte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ancient one to the modern one; the content of moral has changed; the displacement occurred on moral basi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evolution of moral to grasp the trend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West.

Key words: virtue; politics; moral